

长途跋涉即将开始，张深感慨万千。

元末，统治者腐败，张深与胞弟张明、堂兄弟张徽、张清四兄弟，在老家徽州参加了起义军，在庐州集结，因此他们的祖籍有徽州和南直庐州的说法。一场残酷的战斗之后，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，建立明朝。

只是，元朝的残余势力在云南等地尚且不稳，不时地挑畔着朱元璋的权威，“云贵高原还被元朝把把兀剌瓦儿密占据着，他不但屡招不降，而且野蛮地屠杀使者”（《鳌山卫古城》）。这位明朝开国皇帝盛怒之后，决计讨伐，于1381年（洪武十四年）九月初一，命傅有德为征南大将军，蓝玉、沐英、冯胜、胡海等从湖广、四川分两路进兵云南，征服残余势力，打响了著名的乌撒之战。如此大动干戈，可见朱元璋统一天下的决心，最终他如愿以偿。“1382年（洪武十五年），明兵由四川、湖广两路进入云南，陷昆明，梁王兵败自杀，征南成功”（《中国通史》）。

在清光绪版《威宁县志》的记载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：“明洪武十五年正月设云南布政司及都司、各府、州、县、卫、所，于乌撒土府心腹地置卫，仍曰乌撒。”是年正月，在乌蒙山区设立了乌撒卫指挥使司（现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）。

每次探寻青岛人的来源，总避不开乌撒卫（乌沙卫），是因为此后的迁徙与此地

相关。

1383年（洪武十六年）末，朱元璋给征南大将军沐英发布诏书称：“云南虽平，而诸蛮之心尚贰，大军一回，恐彼向善为患。尔其留镇之扶绥平定，尚召尔还。”于是，驻军屯田制度成为主流驻扎方式。

张深此时的身份和张徽一样，都是乌撒卫千户，张清、张明任百户，“祖居小云南乌撒卫十字街东大槐树底下”（《即墨张氏族源及一世追述》张充利作）。

时间来到明洪武二十一年，鳌山卫成立，张氏兄弟奉命北上，张深后裔十三世孙张希贤（清乾隆年间任登州府教授撰《乌撒考》）载：“洪武十五年深公为乌撒卫千户，二十一年换防鳌山卫”。

从乌撒卫到鳌山卫，千里迢迢，其中艰险，已难以复原。从《承远堂张氏二三事》（张方纲作）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张氏先祖行走的路线，“由乌撒卫来山东的路上，前半段走旱路。中间一段，即从渝州朝天县至淮安，走长江和大运河水路，至长江忠县段，张深命舟泊铜锣湾，率族人谒桓侯祠（俗称张飞庙），舍香火资。又命有司测量山门方向，罗盘显示果然西北向。至淮安，弃舟陆行，途次赣榆时，辎重改由海路运送”（《乌撒考》），还记载了另一次迁徙的路线：“明永乐二年，朝廷曾将乌撒卫的大批汉族军士和军户调往山东，他们从陆路到

重庆，乘船渡三峡顺流而下，直抵江苏的扬州，然后转大运河至淮阴，弃舟陆行，取道赣榆、诸城、胶州而达即墨各地。”

道路艰险还不算什么，最让人刻骨铭心的当属骨肉分离，而这样的情节频频上演。

“张深所部有吕氏四兄弟，分别押运海船和骑马行军，洒泪而别时，难料几时相见，遂将饭锅分作四瓣，各执其一，日后凭锅认亲”。

终于，到达了目的地，然而，“城池尚未竣工，部队驻王哥庄”。

此后，张氏兄弟都在鳌山卫为官，张徽在鳌山卫任千户，正五品，住鳌山卫城内，辖鳌山卫以东海域；张清在“浮山各御千户所”任百户，正六品，住浮山所；张深为官在鳌山卫任千户，正五品，住鳌山卫；张明为官在栲栳岛、灯萤所、嶸山所任百户，正六品。他们的后人大多分布在即墨的村落中。

张氏兄弟的经历，是鳌山卫军队的主要来源之一，鳌山卫古城居住的当地居民有李、何、冯、陈、刘、韩、邱（以上姓氏较多）、焦、朱、戴、常、于、张、黄等，根据各个族谱的记载，可以找出他们的共性：他们的祖先都是在明朝洪武或者永乐年间，随军征战，建功升迁，后来来到鳌山卫任职的，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十代世袭；他们中大多数的来源地极有可能是乌撒卫。

巾幗不让须眉 白袍夫人扬威



数百年的历史进程，使得鳌山卫的名望，即使在太平年月也一直留存，直到今日，当地的名称都与此相关，而后世流传至今的，有动人传说，更有英雄故事。

在《鳌山卫古城》中，篇幅最长，情节最为感人的，当属白袍夫人的故事：

白袍夫人的故事据称在南里村《朱氏族谱》中有相关记载，而且在即墨内久传不衰。讲述的是济南府马小姐，生于武术世家，自幼随父习文练武，文韬武略兼备，十八般兵器皆精。父亲膝下无子，马小姐立志学花木兰、穆桂英，“誓循其迹，步其路，必不辜负家严之希冀”。父亲于是把平生所学教给女儿，马小姐名噪济南府。当时，明军中有一位名叫朱迳（南里村朱姓一世祖）的年轻将士，曾随朱棣征战南北，从百户、千户一路升迁为将军，在朱迳率部驻守济南府时，在山东都司长官撮合下，与马小姐结为伉俪。自此，两人夫唱妇随，马小姐跟随丈夫征战沙场，成为朱迳之臂膀。

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年），朱迳奉命率部征宁夏时，突遭敌军狙击，马夫人判断准确，劝丈夫用火攻，结果大胜。永乐元年，朱迳与夫人奉旨北征，在齐眉山之战中，朱迳不幸中流矢阵亡。马夫人见丈夫遇难，悲痛之余，着素袍，跨白马，握钢刀，率长子骏、次子骧冲锋陷阵，为夫报仇。作战中，次子畏缩不前，马夫人见之大怒，立马横刀斥责其不忠不孝，斩其马下，并训示三军：“后退者，以逆子为例，军法无情！”亲子被斩，众皆骇然。马夫人率军从午后战至傍晚，冲破二十多道关隘，斩敌将三十多员，折敌旗五十多面，终使敌军不支，落荒而逃，齐眉山一战大获全胜。

此战，马夫人负伤数处，血染素袍，汗浸战衣。事后，明成祖朱棣为褒奖夫人马氏英勇杀敌和大义灭亲的壮举，便敕封其为“明威将军”“白袍夫人”及鳌山卫世袭指挥使，并命丹青名手绘制夫人影像，加盖皇帝御宝，以光宗耀祖。自此，朱氏便从一世祖至明末九世祖皆为世袭鳌山卫世袭指挥使。

“白袍夫人”自坐镇鳌山卫之日起，忠于职守，将祖传技法“马氏击”传授给将士，使鳌山卫“马家军”名扬卫所，倭寇闻风丧胆。“白袍夫人”的画像传于朱氏长支，每逢年节，祖庙朱氏子孙膜拜、缅怀。

到底“白袍夫人”是否真有人，对此郭泮溪教授曾专门撰文《白袍夫人：明代鳌山卫的巾帼英雄》。他指出：朱迳最高的官职是百户，并没有当过千户和将军。历史上被明成祖朱棣封为明威将军者，是朱氏二世祖朱骏，但不久后因为犯错被降职，之后虽靠军功又拿回封号，但很快便病故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二人都没有一位会武功的夫人。

那么，是否巾帼英雄就是杜撰呢？郭教授告诉半岛记者，也不尽然。朱氏确实有一位代替丈夫披挂上阵的夫人，即朱氏三世二叔祖朱鉴的夫人。据《朱氏族谱》记载，朱鉴于明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“承袭世职，升都指挥使，守大宁”。明正统七年（1442年），身为正三品的都指挥使朱鉴阵亡，他的夫人强忍悲痛披挂上阵，为亡夫报仇，带领着残余的明军冲锋陷阵，奋勇杀敌，让陷入重围的明军转败为胜。郭教授说，这位武功高强的朱鉴夫人，便是民间传说中的白袍夫人。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巾帼英雄，被朱氏后人尊称为“朱大奶奶”。但是，遍查相关文献记载，明正统皇帝朱祁镇并没有破例授予“白袍夫人”指挥使的官职，也没有封她为明威将军。



古城西北角遗址



古城遗址



古城陨石（万盏灯）



南门门额

方城拔地而起，倭寇闻风丧胆。

迁徙而来的士兵们用血汗筑造了鳌山卫城。这座城池在当时有多宏伟？鳌山卫城“周五里”（清同治版《即墨县志》），比同时记载的即墨县城“周四里”还大，可见其占地规模。城墙周围还环绕着一条护城河。护城河深一丈五尺（合8.25米）、宽二丈五尺（合13.75米）。河里流淌的是海水，船只可以从海上直达护城河内。南门外护城河上，立有吊桥一座，遇有战事拉起吊桥，关闭城门，防御敌人。

鳌山卫下辖三个所：浮山各御千户所，即前所；雄崖守御千户所，即后所；卫附一所，即右所或中所。“可见，从洪武二十一年之后的200多年间，鳌山卫集军事指挥与行政管理于一身，有过一番非常兴旺的景象”（《鳌山卫古城》）。

当年的鳌山卫，兼具军事指挥和行政管理的双重职能，因此设有文、武两个衙门。《鳌山卫古城》主编、即墨文史专家黄济显先生告诉半岛记者，编著书籍时，他曾访问了七八位耄耋老人，他们根据所见所闻，还原了古城的诸多细节。比如文、武衙门，位于圣人庙的西北处。宽大的十字街与密集街巷纵横交

织，文武衙门及72座大小庙宇星罗棋布。离十字街东大道约20米处，西侧有一条南北方向的大道，两边各有一道高墙，人们称它为箭道，是练武射箭的地方。大门向南开，进大门有一操场，东西约有60米。两衙门相连，文衙门在东，武衙门在西。

半岛记者注意到，鳌山卫内还开设了卫学，足见当时的军事机构也重视教育。“卫学其实就是当时的儒学，其廪生、增生的定额与县学同等，都是20名，相当于高考录取时，给各个地方的名额，鳌山卫与当时的即墨县地位相等，卫学的教授相当于五品官”，黄济显先生说，在当时县令才不过七品官，可见鳌山卫的地位不凡。

军籍在当时是世袭的，不过要转为考取功名，需要放弃这一特殊待遇，青岛大学教授、民俗专家郭泮溪先生告诉半岛记者，《朱氏族谱》中就曾记载一位朱姓祖先，为了考取科举曾放弃军籍，后来因为科举失败，又曾申请恢复军籍。

鳌山卫城内机构较全，但其实很长时间内人口并不多。

从《白梅安梁四氏合谱》的记载看，

他们来鳌山卫供职共有兄弟四人，皇帝分别赐了四姓，他们迁来之初，家属们居住在今鳌山卫街道的马山前社区，后来各自搬迁离去，可见当时的军人不全是在鳌山卫城里安家的。据老人们讲，一直到上世纪30年代，鳌山卫城里有一半以上是空地。那么为什么城池还建设这么大呢？黄济显先生说，“里面的空地上种满了庄稼，一旦遇到战事，就得紧闭城门，在被敌军围困的情况下，城内的军队还可以长时间自给自足，维持生计”。显然，此为战争策略。

岁月的涤荡给了建筑无尽的沧桑。

明正德元年（1506年）七月，鳌山卫一带发生了一次大地震，使鳌山卫城遭到了破坏，城墙垛子进行了修缮。而后，随着倭患的消除，从清初开始，朝廷就减少了卫所的编制和职能，直至雍正十二年冬（1734年）奉旨裁并鳌山卫并于即墨县。鳌山卫失去了旧日的光环，逐渐归于沉寂。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日本侵占青岛，古城在战火中一次次失去原本古朴的容颜。1953年，城门和部分城墙被拆除，随后，大部分古迹也逐渐消失在岁月中，往事和传说只在百姓的口中相传中继续。